

● 刘司斌

梁启超先生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对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梁启超先生,人们往往侧重研究他的思想、政治活动及影响,其实他学术上的成就暨对我国学术、文化事业,尤其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并不亚于甚至超过他政治上的影响。

从实践上讲,梁启超先生是“近代藏书楼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1917~1927)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在理论方面他写了许多有关图书馆事业的文章,并提出了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新思想。

我国有悠久的藏书历史。在我国藏书楼发展成为近现代图书馆的过程中,梁启超先生起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先生十多岁就熟读四书、五经、通鉴和文选^{〔1〕},并熟知我国传统的藏书形式,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中的“通人”。这为他以后从事图书馆事业打下了基础。

他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时,就认识到学术强国的重要,而从事学术研究必须有大量的图书。当时把图书集中的地方叫“书藏”。他在《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

中列举了中外创办“书藏”之明效,并“与二三同志,各出其所有之书,合庋一地,得七千余卷,使喜事小吏典焉”,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2〕}。这是梁启超先生第1次从事图书馆事业。

戊戌变法期间,知识分子和一些官吏办了不少学会、学堂、译书局等,这些机构多数都设有藏书楼。这时的藏书楼已经与人民大众,首先是与知识分子结合了起来,正如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当时的藏书已不再单纯为私家收藏,已具有了近代图书馆的某些特点^{〔3〕}。梁启超先生是戊戌变法运动发起者之一,他不但在办学会、办学堂方面成绩卓著,而且为藏书事业大声呼吁,并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他的《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有“七曰藏书”,《论学会》的16项工作中有“七曰咨取官局书籍,概提全分,以备储藏;八曰尽购已翻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九曰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十曰广翻地球各报,布散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收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备流览;十二曰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4〕}以上6项中,前5项都直接与藏书楼有关,而第6项以康有为的“书器库监督”为例,也是有关藏书楼收藏的内容。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介绍“泰西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兴学校、曰新文馆、曰书籍馆”^{〔5〕}。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提到强学会应办的5件事中,便有“开大图书馆”一事^{〔6〕}。1912年10月21日,梁启超先生在莅临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中称:“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即欲办图书馆与报馆”^{〔7〕}。

梁启超先生对别人建藏书楼也热情地予以支持。强学会被迫中辍后,会员美国人李佳白想建“尚贤堂”,“思集金二十万,次第举藏书楼、博物院等事,与京师官书局、大学堂相应”。梁先生即为李佳白写了《记尚贤堂》一文,期望其建成^{〔8〕}。

我国藏书楼发展成为近代图书馆,是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随着藏书楼的衰落,维新变法人士创办了新式藏书楼。“它们已可视为近代图书馆的

先声”^[9]，而梁启超先生在“新式藏书楼运动”中又是一员主将。

1917~1927年的“新图书馆运动”是“新式藏书楼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在这个运动中，梁启超先生更是功勋卓著。他实地参与了图书馆事业建设，并把图书馆同对国人的文化学术、思想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教育结合起来。他认为，为著名学者和爱国英雄建立图书馆，意义是多方面的：人们从中获取知识时，也受到学术思想的启迪，高尚人格的熏陶；爱国精神的感染。

1923年，安徽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在被成为“前清学者第一人”的戴东原读书故址建了“戴东原图书馆”，梁启超先生对此给以高度赞扬，说人们会由图书馆，感到“夫一国中贵有大师者，非谓其能尽治天下之学而造其极也。彼其人格足为后世楷模，于其学能引端绪，使人由其涂焉以隅反而孟晋，则其所绳继而浚发者无勇极也。则东原先生其人也。”^[10]

1916年，蔡锷（松坡）逝世。1917年梁启超等拟建“松坡图书馆”。1918年，先在上海成立“松社”，1920年梁启超先生访欧回来后，组织了读书俱乐部，并收藏外文图书6000余册，国民政府也拨给他们宜都杨守敬的旧藏中文图书25000册。1922年，他们申请得到北京北海快雪堂和西城石虎胡同七号官舍。当年，他们成立了干事会，公推创办人梁启超先生为馆长。1923年11月召开成立大会，设快雪堂为第一馆，石虎胡同七号为第二馆。不久，两个馆先后向读者开放。梁启超先生说：“蔡将军为再造民国之伟大人物。而其唯一之留贻纪念，实在本馆。本馆永存，则蔡将军之精神随而永存；本馆光大，则将军之志事随而光大。登斯堂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爱国之心，油然而生焉。然则所关系者，又岂徒以典籍嘉惠士林而已。”^[11]

松坡图书馆对国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949年，松坡图书馆归并到北平图书馆。华北人民政府给松坡图书馆干事会颁发了奖状，称赞他们的精神“实堪褒扬”^[12]。

1925年，国立京师图书馆成立，任命梁启超先生为馆长。当时经费没有着落，梁启超先生奔走借垫，直至“将个人十余年来所积存之永年人寿保险单，商由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藉充馆用。”^[13]从1925年到1927年6月，国立京师图书馆就是这样维持下来的。

1929年，梁启超先生逝世。1930年，梁先生

的继承人遵其遗愿，将梁启超先生的全部藏书“永远寄存，以供众览”，交给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些书籍，“除饮冰室全部藏书，共2831种，约41474册，新书109种，145册外，尚有墨迹、未刊稿本及私人信札，均为重要史料，至于宝贵。”^[14]梁启超先生及其继承人的做法，赢得人们的钦佩和尊敬。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中说：“本馆去岁承梁任公先生遗族以梁先生全部藏书寄存本馆公开阅览，学者称便。”^[15]可见梁启超先生的书籍对文化、学术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今，北京图书馆仍有“梁启超专藏”。

作为学者，梁启超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图书馆技术及学术研究的成果。早在1896年梁启超先生就发表了《西学书目表》，提出了具有一定理论体系的图书分类法^[16]。以后又有《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图书馆季刊发刊辞》、《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包括残稿）、《佛教典籍谱录考》、《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碑帖跋、《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述^[17]。这些著述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既广泛又深刻，已涉及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许多方面，如图书馆要素中的读者和读物、分类和编目问题，同时还提出了“编纂新式类书”的重要提案。虽然我国有编纂类书的传统，“但编纂的方法用今日眼光看来，当然缺点甚多，有改造的必要”^[18]。“做了这项工作，使阅读人对任何问题着手研究，立刻可以在图书馆中得着资料，而且馆中所设备可以当他的顾问。”^[19]

二

梁启超先生经过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通过许多具体工作和对国情及世界情况的了解，抓住了当时中国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关键：建立“中国图书馆学”^[20]，并使之“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21]。

梁启超先生曾反复论述了“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是为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最好是有有一个规模完整的图书馆，将学校附设其中，一面教以理论，一面从事实习；但还有该注意的一点，我们培养图书馆人才，不单是有普通图书馆学智识便算满足，当然对于所谓‘中国的图书馆学’要靠他做发源地。”^[22]“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附充一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23]

至于学习和借鉴外国图书馆学、外国图书馆建设经验,研究和整理中国书籍和中国目录学,进行“分类”、“编目”、“编纂新式类书”工作,都是为着建设“中国图书馆学”。

梁启超先生在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首先使用了“中国的图书馆学”这一名称,不久,在《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辞》中又正式提出“中国图书馆学”这一概念。

虽然梁启超先生没来得及写出一部《中国图书馆学》专著,但是,从他一系列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图书馆学”系统的大致轮廓。可以说,梁启超先生已经初步形成了他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思想。其框架可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一)“中国图书馆学”的性质。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24]。而“中国图书馆学”则是一门研究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在梁启超先生的著述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藏书情况、中国“近代藏书楼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的论述,他主张“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理去整理他”,使之“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25]。“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藪”^[26]，“中国图书馆学”的性质则是在中国“管群学之枢键而司其营养焉”^[27]。

(二)“中国图书馆学”产生的条件。梁启超先生提出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时候,“图书馆学成为一专门科学,最近十余年间事耳”^[28]。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在当时的科学史上是少见的。尤其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这样的学科,梁启超先生认为具有其必然性。

首先,我国图书、图书馆(藏书楼)和图书馆(藏书楼)事业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我国他事业或落人后,而士大夫好读书之习则积之既久,故公私藏书之府彪炳今昔者未易一二数。”^[29]

其次,我国图书独具特色,并已有丰富的藏书研究成果。“中国书籍的历史其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同之点”。“然中国文字自有特色故,以学术发展之方向有特殊情形故,书籍之种类及编法方法皆不能悉与他国从同”。^[30]历史上,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章学诚、陈振孙、晁公武等有丰硕的研究成果。

第三,科学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象中国这样的文明大国,应该有自己的图书馆学。“各国因其国情不同,有所特别研究贡献,以求一科学

中支派内容之充实,此则文化的民族所宜有事也。”^[31]

第四,“中国图书馆学”是中国人创建的,我们经过对祖国文献的研究,对以往成果的汲取,对外国图书馆学的学习和借鉴,加上我们的聪明才智,经过认真试验,“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外国学者无论学问如何渊博,决不能代庖”^[32]。

(三)“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一是图书馆。包括图书馆建筑、图书馆管理、读物和读者(梁启超把读物和读者看作是图书馆的两个要素^[33])。二是图书馆事业。包括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梁启超先生在提出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同时,也承认有“各国从同”的“图书馆学之原理原则”,强调应用“公共之原则”^[34])、外国理论和经验研究(梁启超先生生前研究了英国伦敦大书楼,美国的经验,中国古代章学诚的理论等)和图书馆学教育(梁启超先生十分重视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他认为,“使多数人得获有现代图书馆学最新之智识,且谙习其运用以为改变旧馆增设新馆之资,此国人所宜努力者一也”^[35]。培养管理图书馆人才,是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责任之一^[36])。

(四)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方法。基本方法有3:

1.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图书馆学,“应用公共之原则”,结合我国国情,建设“中国图书馆学”。

2.研究和试验。“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37]。对多而难的问题,“非经多数人的继续研究,实地试验,不能决定”^[38]。

3.依靠“中国现代青年”和培养出的图书馆人才。梁启超先生为此拟定出了5个具体方法:

(1)组织分类、编目机构。编制严密好用的目录,使其不仅适用全国,而且适用外国图书馆内的中国图书。

(2)选择一个适当城市,建立一个大型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学者的研究中心。

(3)在模范图书馆内,附设一个图书馆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其注重“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

(4)这个模范图书馆完全公开,不收费,并作为图书馆技术和方法的试验基地。

(5)筹措资金,编纂类书^[39]。

(五)“中国图书馆学”在世界图书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图书馆学”是世界图书馆学的一部分,对世界图书馆学将有特别贡献。同时,“中国图书馆学”又是世界学术和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开出新发展的途径,无论何国的图书馆关于中国书的部分,都能享受我们所建设的成绩。凡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可以免除许多困难。所以这种工作,可以名为世界文化工作之一部”^{〔40〕}。

梁启超先生提出的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和他的具体工作成果,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几十年来,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许多方面,特别是现代技术的应用远远超过了梁启超先生的设想。但是,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用“现代图书馆学最新之智识”“改良旧馆,增设新馆”,使我国图书馆事业走在世界前列,使世界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则是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的。中国应该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为此而努力。

参考文献

- 〔1〕 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1
-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北京:中华书局,1988.24.
- 〔3〕〔24〕 桑健.图书馆学概论.大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变法通议》.北京:中华书局,1988.33.
- 〔5〕〔7〕〔16〕 张锦郎,黄渊泉.中国近六十年来

图书馆事业大事记.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

-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8.127
-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记尚贤堂》.北京:中华书局,1988.31~32.
- 〔9〕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221~222
-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戴东原图书馆缘起》.北京:中华书局,1988.110~111.
-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松坡图书馆记》附《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北京:中华书局,1988.29.
- 〔12〕 宋益民,吴景熙.《松坡图书馆始末》.北图通讯,1982.(2)
- 〔13〕 毛轩华,权儒学.北京图书馆馆史(1948年以前)档案选录(下).文献,1987.(4):223
- 〔14〕〔15〕 毛轩华,权儒学.北京图书馆馆史(1948年以前)档案选录(下).文献,1988.(1):241
- 〔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除“残稿”见于1941年旧版外,其余俱见北京中华书局,1988版
- 〔18〕~〔20〕、〔22〕、〔23〕、〔25〕、〔27〕、〔29〕、〔33〕、〔34〕、〔36〕~〔4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北京:中华书局,1988.42~49.
- 〔21〕、〔28〕、〔30〕~〔32〕、〔3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词》.北京:中华书局,1988.8~9.
- 〔26〕 同〔9〕.226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兴安岭中学。
来稿时间:1991.7。编发者:徐 苇。)

(上接45页)

字母区分。假若仍重号,不另统一规定是否合适,尤待讨论。

4.罕见字的配号问题。

由于罕见字量大,又异常分散,若不按频率一字一号,容易做到,假若按接近频率配号,则混合三位数容量不够,起码需4~5位数以上。这样,号码长,不便工作。但是,收列汉字达到四声定位后按笔画顺排,重号就可能更少,在混合三位数字以内收列汉字达到四声定位,只能几字一号,这

将可能出现这几个字的临近交叉。因是同一个号码,权衡利弊是否以后者为宜。

以上是我们对建国以来书次号研究的现状和前景的一些述评浅见。现在,全国文标会第五分委会已经把全国的著者号课题组和研究同仁们组织起来,我们相信,我国书次号的研究和实践一定能趁此大好时机,取得更大的进展。

(作者单位:侯有德,河南技术师院。张宇宏,洛阳工学院。赵怀生,安阳市图书馆。来稿时间:1991.9。编发者:丘峰。)

A Review of the Automation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for Chinese Material in the United States / Zeng Lei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2, 18(2).46~58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1991, there are over a hundred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holding a total of more than ten millio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materials, among which there are 50%-80% Chinese records. The initial study made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of Chinese material dates from the last decade. Among the departments that made the study, the RLIN (Research Library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the 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are the two systems of uttermost importance. The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automation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for Chinese mater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ive focuses already discussed. 9 illus. 1 table. 1 appendix. 25 references.

Chinese materials —— Automation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Bibliographic control —— U.S.

Automation —— History

G257.2-39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s System / Xie Xinzhou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2, 18(2).59~62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s in the 1970s, libra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have devo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t. To date, it has already developed to the third generation. The OPAC System makes those users who lack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be able to use it directly. It provides the users a kind of capability to access, which is neither like the order language with a very complex function, nor is it like the "menu" one with a very simple function. The interface design of it is an important phase of OPAC device, the study of which falls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the matching aid. 2) the retrieval aid. and 3) the semantic / contextual aid.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services of OPAC opens up a wide range of prospect for readers to use library materials directly.

On-line systems —— developments

OPAC —— Appraisals

G356.3

Contributions Made by Liang Qichao to the Library Undertaking / Liu Sibin /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2, 18(2).65~68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re was a renowned man called Liang Qichao (1873-1929), who is celebrated both as a politician, a thinker and a scholar in China. Even since his early years, Liang had been engaged in the "modern bibliotheca movement" and had initiated the "new library movement". In 1925, he proposed the though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which may be concluded with the following 5 categories: 1)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2) Conditions that make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come into being; 3)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4) The ways and means of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5)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n that of the world. Liang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both to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Library undertaking —— China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 1930s

Liang Qichao —— Library activities

G250-092